

# 罗 洪 创 作 初 论

艾 以 王 平

罗洪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自1930年在《真善美》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平行线》至建国前夕，她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两部 and 一部散文、随感集。她用敏锐的观察力深入地探索人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出人民的感情和时代的足音，展示了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她的作品以题材广阔、人物多样、文字朴素、无女性的“委婉纤柔”而引人注目。在我国新文学宝库中，罗洪的作品具有自己的光彩。本文试从罗洪创作的几个阶段，对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作些初步探讨。

1910年，罗洪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原名姚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受父亲的影响，罗洪自幼爱好文学，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书本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怀，使她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把视线和感情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她开始注视社会，关心人生。她的学生时代，正当中国内忧外患的危难之秋。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帝国主义挑衅，疮痍满目的旧社会，恶势力闻鸡起舞，人民处于苦难之中。年青而充满正义感的罗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渴望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1929年她从苏州女子师范毕业，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她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不断地接触到许多悲哀痛苦的人，在人们的笑影里我看到泪痕和欺诈，幸福和愉快实在太缥缈了……。这种现实的感受，使我改变了童年时代天真的幻想和憧憬，生活又不允许我在实际行动上为人群捐起什么责任，于是我只能忙里偷闲地去运用笔杆了。”（罗洪《创作回顾》）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的为民众的愿望，这位女作家开始了文学生涯。

1931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是罗洪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腐鼠集》（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儿童节》（193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等。这些作品多数反映社会问题，内容大致有三方面：一、写城镇居民的苦闷矛盾和希望幻灭；二、表现农村日益凋敝、民不聊生；三、描写青年人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

罗洪对自己周围的人们和他们的命运给予热切地关注，作品着力表现他们的痛苦和哀愁。如《迟暮》中的老太太，靠替人接生起家，她的孙子一面用她攒下的钱娶媳妇，一面又嫌

她的职业丢人。带着顽固的封建观念，老太太原谅了孙子对她的蔑视，却不能容忍孙媳妇花枝招展的打扮。当她看到孙子和孙媳妇一起大手大脚地花钱，整天无所事事地吃喝玩乐时，劳累了一辈子的老人不禁感慨万分、迷惑不解，想不到继承自己血统的后代，居然和她疏远到这般地步。痛苦烦恼之中，老人不得不重操旧业，借此摆脱迟暮之年的孤寂和忧愁。小说不仅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在新的社会势力的冲击下必然解体的趋势，也表现出两代人中间的鸿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青年人的消极、沉闷、没有理想的人生态度。在《祈祷》中，作者描述了一个受封建礼教束缚丧失了幸福的青年妇女的悲哀。这是作者唯一的一篇恋爱题材小说。写的是一对青年人倾心相爱，由于女主人公曾有过丈夫，所以社会舆论不允许她再次结婚，而她自己思想中固有的封建观念，也阻止她朝幸福生活再迈进一步。于是在每天向上帝的祈祷中，她心底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了。罗洪借这些人的悲哀来抒发“人世原是污浊的”（《流浪的一年·序》）感叹。现实的污浊既给成年人带来痛苦，也不放过天真幼稚的孩子。无钱付房租而失去栖身之所的孤儿寡母躲到火车站避雨，面黄肌瘦的孩子贪婪地望着食品推销员手中的糕饼不住地喊“饿”（《饿》）。《儿童节》中的孩子，原打算趁节日畅游一天，可是他们的兴趣被老师和家长的意志扼杀了。作者以女性的敏感，用不被人们注意的儿童的生活遭遇，不动声色地责备了摧残幼小心灵的社会罪恶。尽管作者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勾勒时代背景，可是透过她所刻划的一个个人物的遭遇和他们的苦闷忧伤，我们看到的是那种笼罩着他们的社会黑暗。作者的笔触是批判的，鞭挞的是整个社会。愤世嫉恶是这些作品的基调。

随着社会的动荡和个人阅历的增多，特别是与农民交往后，罗洪接触到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因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加深了，反映在创作上，作品的主题也深化了。她从倾吐人们内心悲哀转向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白的风暴》、《烟馆小景》和《到哪里去》等短篇，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农村濒于破产的社会现象。《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中的阿根，象所有憨厚纯朴的农民一样，以为凭着自己强壮的身体和辛勤的劳动，就能养活一家人。可是连年的灾荒，高利贷的盘剥，使他陷入绝望的泥潭。无法生存的农民希望到城市去找一条活路，《到哪里去》中的秋裕，是抱有这种幻想的农民的典型，而彭少爷的苦恼，形象地回答了此路不通。彭少爷在城里念书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他想回家乡来创基立业”，可是在家乡他见到的却是贫穷、怨骂、土匪和绑票。望着成群结队沿村乞讨的难民背影，他怅惘地自问：“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的疑问同样透露出罗洪的思索。她已经意识到单单写出劳动人民的苦难是不够的，应该为他们指出一条活路来。路在哪里呢？在《血》、《血淋的手》等短篇中，罗洪进行了有益地探索。《血》叙述了一个可歌可泣、大义灭亲的故事。那位三十岁的青年出于爱国心，杀死了当了汉奸、成为侵略者帮凶的姊夫。而爱国青年反倒成了凶手，被送上法庭。他慷慨激昂地对记者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这里，作者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律，赞扬了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否定了个人复仇的道路。在《血淋的手》中，作者回答了正确的道路是什么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主人公“我”参加地下工作不久，即受到敌人的监视。一天早晨，他打开房门时，一只血淋淋的手臂出现在他脚跟前。这正是隔夜和他接头的石膏的手。面对淋漓的鲜血，主人公觉得“用恐怖来制止和捣乱是笨拙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能被恐怖征服的人，能被恐怖掩住的反抗。”主人公坚定不移选择的道路，正是作者要向人们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投入人民大众摧毁整个旧社会的斗争。从罗洪对人生道路的探索中，表明了她的小说创作与社会生活、革命斗争的关系日益密切的进

步趋向。

罗洪早期作品的风格比较沉郁，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与她作品的选材有关。罗洪在选材上的特点是不落俗套。“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算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郑树森《读罗洪小说札记》）。她能从各个方面去反映三十年代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反帝反封建的主题。那连年自然灾害、变本加厉的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迫使农民背井离乡的图画；那白色恐怖下，革命者惨遭迫害的场景，一旦被作者从现实中移入作品，必然产生沉郁的气氛。其次，与她的写作方法有关。这时期的作品，罗洪大多采用细致的心理描写手法。她描写黑暗现实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痛苦。即使是对爱国青年的描写，她也没有随风趋时地去写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革命兴奋和幻灭”的情绪，或“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激情，而是注重描绘他们艰辛求索的心理。这些人物的心理经罗洪的彩笔点化，具有一种内在的感染力，产生沉郁但不感伤的艺术魅力。

## 二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罗洪创作的转折点。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敌人的炸弹激起了女作家的满腔愤恨。她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抗战的前途。她的作品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思想内容得到新的升华。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卫登陆后，罗洪一家撤出故乡，迁往桂林。她把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散文集《流浪的一年》（1939上海宇宙风社），散文和小说合集《为了祖国的成长》（1940年烽火出版社），还出了短篇小说集《活路》（1940年上海文艺新潮社）。

罗洪这时期的创作，大多是散文，篇幅短小，情绪强烈。作品所抒写的美好事物和情思，都是作者自觉而敏锐地从实际生活中撷取的，富有积极的意义。如《忆富春江》、《四季桂》等。富春江两岸如火的枫叶，桂林的奇异山水和四季桂的阵阵清香，增添了罗洪对祖国的新的恋情，她说：“虽然每次走上流亡的路都饱受了风霜雨露，但我对着那无边的原野，起伏的山岗，澄清的河流，总感到极度的兴奋和亲切”（《祖国的怀抱》）。她工笔细描旖旎风光，让人陶醉入画。但是，她并没有超脱残酷的现实，从严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逃遁。恰恰相反，罗洪满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激情，在描绘祖国锦绣江山时，愤怒的笔触直指民族敌人。她的作品在淡抹浓妆美丽山水的后面，往往会突然跳出几行看来似乎音调极不协和的字眼，犹如平地一声雷，使人们从山水的迷恋中猛然醒悟，而去正视血淋淋的现实。读罗洪的作品，不仅要用眼，而且要用心，在作品所反映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女作家的身心由于愤怒在颤慄。当她在旅途中经过古朴雄伟的城门时，看到中国人向日本卫兵委屈地鞠躬，不禁义愤填膺，她写道：“这种冤屈不知到哪一天才洗掉，哪一天我们大中华民族才能扬眉吐气”（《死去的城》）。在《永远的仇恨》里，她记叙了日本鬼子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他们在渡船上持枪威逼一位中国妇女把怀中的孩子扔进水中。这位妇女仇恨满腔，紧抱儿子投入滚滚江水。罗洪为重压在轭下的群黎控诉，愤懑载指狂暴凶残的侵略者。作家的心跟祖国的命运，跟英勇战斗的人民在一起。当她在新松江社的露天茶场里听到上海人民打响抗战的第一枪时，是多少激动。后来她在桂林追记当时的心情说：“心里那点苦闷给枪炮的响声洗去了”，“这一次，我们的仇恨都应该清算了！”（《期待第一声枪响》）总之，这些散

文无论描写什么事物，从山水到人，从屈辱的一躬到抵抗的枪声，都意在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说明只有全民族同仇敌忾打击侵略者，才能挽救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使生活变得美好、进步和幸福。

叙事与抒情并重是罗洪散文的特色之一。她善于通过娓娓的叙事，抒发自己的表情。她在从家乡向桂林转移的途中，常常为自己受家庭儿女之累不能直接参加战斗而遗憾，在《不眠的夜》里她说：“有时我真想丢下孩子走了，在这样的时代里，有许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年青的人去做，即使用我的笔代替枪杆，也不能躲在这个小镇上面，可是我这种矛盾只在心里滋长，到底没有在行动上实现，我咒诅自己那种因循的劣根性”。在《灯光下》中她写道：“我想着整个民族将在这个大风暴中作一次顽强的挣扎，我们心就急剧地跳着了。又想到自己不能上前线去，心理就有种说不分明的，仿佛是怨艾的情绪。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风暴的时代，应该让自己的生活写一部真实的历史，黎明没有到来之前，我们不应该关在自己屋子里，只用空话来期待。”这些文字情真意切，荡胸涤怀，袒露出诚挚、纯朴和深厚的感情。有时作家缘事而论，将叙事和议论结合起来，通过“融情入理”的议论来抒写自己对祖国深沉的爱恋，对光明的信念和对侵略者的切齿之恨。在《久远的仇恨》里，作者沉痛地记录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她说：“这一切可怕的情形，一方面增强我们抗战的决心，一方面也愈使我感到人类有战争，总是一个极大的缺憾，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朋友，我这么想——人类总有一天会不需兽性的战争吧，你想，到那个时候，人类的生活该是怎样的美丽呢！”

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全民抗战的大好局面。各个阶层的人们对抗战的态度，是罗洪关心的问题，也是她这时期小说的主要题材。她在小说中赞美了应该赞美的人，批判了应该批判的人。《逃难哲学》中的范振声，圆滑自私，卑鄙猥琐。他恬不知耻地在大庭广众前吹嘘他的逃难哲学——“一个人在外面全靠随机应变，碰到哪一类人，就说哪一类的话。”他千方百计阿谀迎合省政府的主席、秘书，或者银行家、绅士，觉得“能跟这些人有几分关系，就什么都不用愁了。”对抗日，他冷嘲热讽，说：“有钱的事，我无论什么都干。抗日，自然也要吃饱了肚子才行。”对范振声的描写，作者使用的纯然是厌恶、讽刺的笔调，用这种讽刺画的形式，对这类不顾民族危亡，但求个人偷生的肮脏灵魂，作了促人深思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爱国青年和人民。《活教育》中那个年轻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弃了到后方继续升学的打算，毅然奔赴抗战前线。作者借青年之口道出了她的见解：“将来的事虽然要紧，但现在应该比将来的更要紧一点。”《融》则叙述了一个沦陷区人民在苦难中觉醒和成长的动人故事。白马塘和三塘村的村民有着世代的宿怨，有时一点小事就会引起两村人的恶斗。日寇飞机扫下的子弹使他们觉醒了，他们认识到：“现在有外国人要来欺侮我们，他们是要把我们打服了当作牛马的，我们一样是中国人，还讲什么冤仇呢！”“我们中国人打日本兵才算好汉咧”。村民们捐弃私仇，抵御公敌，同心协力救祖国。人民的斗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罗洪从抗战军民的英勇战斗中吸取力量，坚定胜利的信心。她说：“那时候，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把侵略我国的敌人统统赶出去”。（《群像·后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她臧否人物，爱憎分明，并且坚信人民一定胜利，美好的未来属于祖国。“光明在前面”是她作品的结论。

从罗洪在这时期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手法与风格的发展。在初期创作中，她注重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与剖析。这时期的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静止的大段的心理描写少了，作者不是用自己的话来说明人物，而是以人物行动为中心展开故事，从对话

动作的描绘中刻划人物性格。如在《融》中，描写白马塘的狗给三塘村的人踢了一脚，或两村的人为了争夺一块小山地而引起的恶斗，以及他们如何会消除夙怨，联络起来打日本人等等都描绘得非常详尽。这样的描写不但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而且还能引起读者的思考。此外，小说也常常穿插一些人物的议论谈话来补充、突出人物性格。十分耐人寻味的是《逃难哲学》中的范振声，他为了巴结心目中的社气名流，到处编造自相矛盾的谎言吹嘘自己，结果名人没攀上，反倒使诚心前来拜访他的客人吓跑了，连旅店的茶房也不再相信他，把他看成是个危险人物。这就把一个寡廉鲜耻的性格表现得十分幽默、生动。

### 三

1939年，罗洪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上海这时已沦为“孤岛”。刺眼的霓虹灯照耀着街头流浪的难民，疯狂的爵士乐掩盖不住痛苦的呻吟声，玻璃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马路上停着笨重的收尸车。酒色灯光难掩血腥现实，畸形繁荣下面是破碎的山河。这块特殊的土地，为罗洪的创作提供了特殊的题材。她写下了长篇小说《孤岛时代》（1946年中华书局）、短篇小说集《鬼影》（1944年福建点滴出版社）和《这时代》（1946年上海正言出版社）。这些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罗洪以前的任何作品，赢得许多读者的好评。在内容上，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市民社会的表现与批判，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王伯炎与李四爷》中的李四爷原来可依靠祖传的薄产，平平安安地度过这辈子，谁知他的美梦被战争的烈火烧毁了。他沦落为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汉奸门下的食客。吃了汉奸的饭，就得听汉奸的使唤，在汉奸霸占王伯炎的祖坟地一事中，他只得违背心愿充当说客。在这些小人物的意识王国内，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辱没人的灵魂的贫困所引起的痛苦。从经济方面观察小市民的命运，是罗洪以前作品中几乎没有触及到的问题。罗洪对于城镇市民是十分熟悉的。她不仅了解这些人受压迫受侮辱的不幸，而且透彻地知道他们内心世界的阴暗角落。在民族战争的严峻考验面前，他们中的某些人尽管不是汉奸卖国贼，但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利用种种机会，不择手段谋取私利。《逃难哲学》中的范振声是这样的人。再如《友谊》中的徐兆璋，在物价飞涨的战乱年头，屯积居奇，发财致富。这时他忘记了往日的贫困，背信弃义地对待曾经为他慷慨解囊的李少卿。还有《践踏的喜悦》中的杜三爷和三太太，等到侄子国梁因参加爱国斗争而被捕后，他们就打算如何“不落痕迹的”让国梁国器俩兄弟从此不再进门，从而侵吞俩兄弟应得的财产，又可以不受牵累。这些小说生动地描写出市民人物的精神弱点，批判了他们身上的市侩气。

战争给各阶层人们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罗洪从市民社会中找到了王伯炎、徐兆璋和杜三爷等人。这一类人物成帮结伙地在作者心中活动，她谙熟他们的历史和现状，敏锐地抓住这些人物内心深处对于动荡的现实所怀的迷惑和恐惧，一种既无法适应周围世界，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哀伤和苦恼。他们看来，现实的一切都在崩溃、变化，可是生命在延续，他们不得不丢弃人格和尊严苟且偷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生活态度甚至于道德观念来适应现实，在意识和行动上又带上了他们那个阶层没落消极的色彩，“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褻渎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罗洪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生活的忠实，既表现了战争给市民群众带来的苦难，又批判了市民性格

的落后性，从这个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第二类，揭露、鞭挞了汉奸、卖国贼。罗洪说：“我要把这些懂懂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鬼影·序》）这些汉奸趁混乱年头摇身一变，成为“新兴权势”，他们认贼作父，对同胞不可一世，横行霸道。《王伯炎与李四爷》中的警察局长赵端民，想强占王伯炎的祖坟地，名义上让李四爷去劝说王伯炎出卖这块地，实际上只等王伯炎张口不同意，就把他送进监狱。《邻居》中的林七，是个胸无点墨的无赖，靠巴结日本人，混上小城中的“上流阶层”，在邻居中间耀武扬威，强行捐款大发国难财，过花天酒地的生活。《鬼影》从赌场中的几个汉奸在短时间内的言行，撕开了“群犬争骨”的复杂内幕。这些鬼影般的汉奸在以前作品中没有出现。

第三类，反映爱国青年的斗争生活。在《群像·后记》中，罗洪说：“最使我激动的是青年朋友们为了祖国，宁愿抛弃家庭，牺牲自己生命，投入战斗”。如果说，在前两类作品中，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凄惨、耻辱和丑恶的话，那么，这类作品让我们看到的是正义和光明。她深切地体会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要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敌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就需要像这些青年人那样去斗争，去生活。《雪夜》、《践踏的喜悦》、《孤岛时代》等作品中的青年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对美好的事物有执着的追求。《践踏的喜悦》中的国梁、国器兄弟俩，他们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吓倒。国梁从监狱出来后，他们就一起奔赴解放区了。《孤岛时代》中的志伟，他走上革命道路是出于对祖国的纯朴的爱。他憎恨社会的黑暗和战争的残酷。忧心忡忡地说：“市面越是不断地趋向繁荣，马路上的露尸就更多。”他不是消极地等待天亮日出，而是用行动去迎接黎明的到来。在叔叔钟成的引导下，他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志伟在监狱中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始终不改变自己的信念，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值得注意的是，罗洪在描写青年成长的过程中，突出了党的领导。《孤岛时代》中的钟成就是负有使命到孤岛上来的党的干部。他一到孤岛上，就把进步青年吸收到组织中来，领导这些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通过钟成形象的塑造，罗洪使我们看到“孤岛”不孤，它和解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的领导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总之，这一时期可说是罗洪文学创作的成熟期。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运用娴熟，小说的题材愈益扩大。作品有批判市民性格的，有歌颂抗日志士的，有控诉汉奸罪恶的，又有表现战争灾难的。作者力图在更广阔背景下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本质，使人们感受到的痛苦和经验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从而充实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这一时期的小说，以刻划人物性格为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十分注重细节的运用。如《友谊》里李少卿那件满是油垢的夹袍子两次在徐家出现，第一次徐太太对它瞟了几眼“好像把过去的事全忘了”，第二次那件袍子竟把“徐兆璋窘得脸色有点发白”，夫妇俩自私、虚伪的嘴脸在袍子面前暴露无遗。还有李四爷，尽管做了赵端民的食客，但还想维持自己的那点所谓尊严而不肯喊赵一声“局长”（《王伯炎与李四爷》）。作者抓住这些细节，赤裸裸地显示了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在人物刻划上还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我们是从对李四爷无可奈何地充当说客，和王伯炎既被抢走祖坟地，又被关进监狱的实写中，看到赵端民的势力和残暴，而对赵端民，作者从没正面去描写，始终用虚笔来勾勒出这个汉奸的形象。（《王伯炎与李四爷》）这时期的小说结构更加完整，布局合理微妙。《践踏的喜悦》中的三太太，绞尽脑汁算计侄儿的财产，但他们却“轻轻松松地扔给她”，她没有经过意想中的争夺，反倒觉得这些钱财一文不值了，她的心也似乎被践踏了。这样的结局，给整个作品增添了完整性和趣味性，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 论冯玉祥的白话诗

应国靖

冯玉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是一个写有大量热爱祖国、体察民情、诗歌的诗人。

从冯玉祥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沉思。在诗中他有时形容民间疾苦，有时吐露政治主张，有时抨击当局腐败，信手写来，不拘一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冯玉祥在《我的读书生活》中主张文艺作品不要老写“公子落难，佳人闺怨”这一套，这样“丝毫不能振作人的精神”他认为要“写大众，写国家，写些为公而不为私，为众而不为己的事才好。不然浪费纸笔还是小事，萎靡人的精神却是关系非浅。”提倡文艺应“作为表达亡国惨痛，激励人心的利器。”纵观冯玉祥写的诗歌，确实感到他那种代表被压迫者的意识，显示时代反抗精神的热烈感情。

愤世，忧国，嫉俗，爱民，是冯玉祥诗歌中主要的思想内容。

简洁，单纯，明白，通俗，是冯玉祥诗歌的主要特色。

在冯玉祥的诗歌中充满了使人心碎的希望，忧郁的悲歌，沉痛的抗议，温存的爱。一句

---

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夕，罗洪的创作量明显减少。蒋介石挑起内战，政治形势令人窒息是根本的原因。“当国内统治者以迫害、暗杀手段禁锢民主生活的时候，上海也没有文艺。文艺需要一定的气候。”（《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这一时期，罗洪仅写下《旅途》、《覃老伯》、《老周的作风》、《时机》、《动摇》、《刽子手》和《生命》等少量作品，其中大多仍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临近全国解放，罗洪蛰居上海，几乎搁笔了。唐弢说：“虽然作家们的斗争仍在继续，并未停止，但他们只能下决心先翻过这一页历史，静待在文学史上谱写新的、为人民所欢迎的曲子了。这就是到了四十年代末期，上海也终于没有创作的原因”（唐弢《四十年代中期上海文学》）。这大概也是罗洪沉默的原因。

综观罗洪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她走的是一条不断探索人生意义的道路。这条路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她有过苦闷和彷徨。但这条路的基石是为人民、为民族、为祖国。这就是罗洪能够从一个怀抱善良愿望的少女，成长为自觉地为国家的前途，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作家。时代和人民哺育了罗洪，罗洪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创作了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她始终用冷静的眼光，客观的描写来颂善扬良，惩恶诛邪。她的笔是冷峭的，心是炽热的。这一切汇聚成她作品中强烈的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罗洪不愧为“真正的小说家”。（赵景深《文坛忆旧》）。